

# 20世纪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回顾

潘其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摘要：古人类学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后，从最初的研究工作主要依靠外国学者，发展到今天已拥有一支自己的研究队伍，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本文对此作了回顾，并介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古人类学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

关键词：古人类学；考古发现；人类化石；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Q9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62(2008)02-0025-13

古人类学或体质人类学是与考古学同时于20世纪20年代传入我国的，当时该项研究工作全为外国学者所垄断，主要有北京协和医院解剖学教授P.H.史蒂芬森(Stevenson)，步达生(D.Black, 1884~1934)，魏敦瑞(F. Weidenreich, 1873~1949)，清华大学的史禄国(S.M. Shirkagorov, 1887~1939)和华西大学的莫尔斯(W.R. Morse)等。著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最初就是由魏敦瑞研究的。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随之而来的日本人类学研究人员在我国东北、华北及海南等地也攫取了一些上古和现代的人类学资料并发表了几篇研究报告。

中国学者李济和吴定良在国外留学时都学过人类学，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狄克松(R.B. Dixon, 1875~1934)和荷顿(E.A. Hooton, 1887~1954)二位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回国后虽然改行转攻中国考古学了，但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吴定良则从教育统计学转攻人体测量学，曾在英国伦敦大学皮尔逊(K. Pearson, 1857~1936)的实验室中工作过几年，返国后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人类学组)主持工作，曾筹备过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后主持过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和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我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和杨希枚均在其人类学组工作过。颜闾曾从莫尔斯和史蒂芬逊学习，1948年曾赴美国进修，50年代末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体质人类学组的工作。由吴定良主持工作的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专业和颜闾主持的考古所体质人类学组都培养出了一些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研究人员。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就在始建于1929年的原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了古脊椎动物的研究室，1957年提升为所建制，于1961年更名为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20世纪60年代初设立了体质人类学研究部门。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先后设立了人类学系，吉林大学考古学系也开

设了体质人类学课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设有考古DNA实验室。

在考古学研究领域自50年代始就存在一条不成文的分工，即旧石器时代考古和古人类(包括直立人、智人及古猿)的发掘研究由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而新石器时代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发掘和出土的人类遗骸研究工作则由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负责。据说这一分工是在两所成立时由梁思永、裴文中和夏鼐等先生协商决定的，这一分工一直延续至80年代中期。但各省市自治区的文物考古部门及高等学校的考古专业并不受此约束。对人类学这一学科的内涵，在欧洲大陆各国和英美等英语国家有所不同。在英美等国人类学所包含的内容较为广泛，他们将人类学分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两大部分，所包含的学科内容非常庞杂，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及考古学等均兼而容之；而在欧洲大陆国家，人类学习上专指人类生物特征的研究，实际上相当于体质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等学科的界限明确。50年代初我国的学科建设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模式，因此在我国人类学学科也是专指体质人类学。80年代中期始有人依据中国历史悠久埋藏在地下文物遗迹和古人类遗骸等极其丰富的条件，提出应该将古人类学的研究与考古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人类学”。

以上简单地回顾了我国古人类学研究发展的历史背景，了解了这一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我国古人类学研究的具体成绩。

## 一、旧石器时代化石人类的主要研究成果

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起始于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斯洛瑟(Schlösser, M)记述了一颗从中药店购得的像是“人”牙的化石，从而表示在中国存在发现古老人类化石

的可能性<sup>[1]</sup>。到1922-1923年德日进(Teilhard, M.de Charlin, P)与桑志华(Licent, E)在河套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清理从宁夏灵武县大沟湾采集的化石中,发现一枚儿童的左上外侧门齿,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河套人”<sup>[2]</sup>。几乎同时,瑞典人师丹斯基(Zadnashy, O)博士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发掘得到两枚人牙化石,当1926年在欢迎瑞典皇储古斯塔夫伉俪访华的欢迎会上,由安特生宣布这一消息之后,立即引起世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从此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学研究序幕,从1927年起在周口店开始正式发掘。70多年来,在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已基本上涵盖了人类起源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即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 1.直立人化石

直立人的全称为人属直立种(*Homo erectus*)是50年代开始普遍使用的。最早称为猿人,周口店第一地点出土的人类化石最初就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现今分类上学名叫“北京直立人”(*Homo erectus pekinensis*),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自1926年正式宣布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现两枚人牙化石以来,我国境内已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地点达10余处,如加上有些遗址虽然尚未发现人类化石,但动物群及文化遗物无疑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则总共达20余处。保存在有较完整头盖骨的有北京猿人、蓝田猿人,郧县猿人等有限几处,多数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是零星的头骨残片或体骨残段,有些仅是几枚牙齿。

最重要的发现当首推周口店北京猿人,前面已提及北京猿人的发现一宣布即引起世界轰动,它在20世纪古人类研究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其重要地位一直保持了近30年。1921年当时任北洋政府农矿部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Andersson, J),到周口店看望正在那里工作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Zadnashy, O)时,就曾预言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sup>[3]</sup>。两年以后果然就发现了两枚人牙化石(一枚臼齿和一枚前臼齿)。1926年师丹斯基回了瑞典,这一重要的发现即由安特生代为宣布,当时就引起包括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美国古生物学家格雷博(Grabau, A.W)和解剖学家步达生的关注。格氏首先将之命名为“人属”“北京人”(The Peking man)。1927年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支持下,正式开始在周口店进行大规模地发掘,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断。在这10年间出土的北京猿人化石计有头盖骨5个、头骨碎片7件、面骨6件、下颌骨14件、牙齿147枚(其中单个牙64枚,其余附着于上下颌骨)、股骨7件、肱骨2件、锁骨和月骨各1件,分别代表约40例个体。同时发现有100多种动物化石及植物化石,还有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大量用火的遗迹。第一例北京猿人头盖骨是在中国学者裴文中主持下发掘出土的。遗憾的是这些宝贵的科学资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美国人转移标本的过程中不幸全部遗失,至今下落不明。所幸魏敦瑞已经详细地研究了这些宝贵

的化石材料,并于1936年至1943年间陆续发表了他对北京猿人头盖骨、下颌骨、肢骨和牙齿的研究专著。他在著作中详细地描述了北京猿人的形态特征,北京猿人的头盖低矮、额骨低平、眉脊粗壮与眉间隆起连成一体形成眶上圆枕、头骨正中有发达的矢状脊、枕部有发达的枕骨圆枕、面骨粗大、眼眶深而宽阔、鼻梁平扁、梨状孔宽短、无鼻前棘、颧骨很高、上颌明显前突、下颌骨粗壮、颌部明显向后下方倾斜、下颌齿槽弓长而窄呈马蹄形、下颌枝很宽、牙齿粗大以及门齿为明显的铲形等,这些特征带有许多明显的原始性质。但北京猿人的肢骨已非常接近现代人。肢骨的进步性说明北京猿人已确立了直立行走的姿势,从而奠定了猿人作为智人祖先的系统地位<sup>[4]</sup>。

由于北京猿人的发现,使得已经争论了20余年的关于“爪哇人”是猿还是人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于是北京猿人被人类学界公认为当时已知的最早人类,它也就成为了人类起源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北京猿人的发现将人类历史向前推了50万年。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研究的热点虽一度转移到了非洲,但周口店遗址在国际古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始终未变,它依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内涵最丰富、材料最系统的直立人遗址。

1977年开始了对周口店第一地点的综合研究,利用古地磁、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电子自旋共振等测年方法,在不同的实验室测试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猿人遗址的年代。从第一层至第十三层的年代为23万~66万年,其上文化层(第四层)距今约29万~32万年,出土人类化石最多的下文化层(第八、九层)距今约42万年,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头盖骨的第十一层的年代据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距今约57~66万年<sup>[5]</sup>。

继北京猿人之后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又一重要的直立人化石是蓝田猿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陈家窝遗址发现一个下颌骨化石,次年又在公王岭遗址中发现一个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两部分合起来称为蓝田猿人或蓝田直立人(*Lantian Homo erectus*)。对蓝田猿人头盖骨和下颌骨的研究结果表明,其眶上圆枕比北京猿人更为粗大,眉间部也较为突出,头骨之骨板极厚,头盖更低矮,上颌牙齿比北京猿人更粗壮。蓝田猿人的伴生动物群,分别为中更新世早期(陈家窝)和早更新世晚期(公王岭)。古地磁法测定的年代约65万年和110~115万年。因此,无论从动物群所代表的地质年代还是实测的年代,蓝田猿人均较北京猿人生活的年代更早,形态特征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这一点。蓝田猿人与北京猿人在头盖骨和下颌骨上所呈现出的形态差异,可能意味着两者有时间先后的关系<sup>[6]</sup>。

在我国发现直立人化石的地点还有云南元谋、湖北陨县、安徽和县以及南京汤山等遗址。

元谋猿人只发现了两枚门齿,系明显的铲形门齿。元谋猿人出土地层的年代,据古地磁法测定约为距今170

万年,用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得年代约距今160万~110万年,应是中国境内迄今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直立人<sup>[7]</sup>。

湖北陨县猿人,所发现的两具头骨虽然大部分骨骼都保存下来了,但由于受到地层的挤压,颅骨的整体形状已严重变形。因此,学者对其分类位置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属于直立人阶段,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属于早期智人<sup>[8]</sup>。

安徽和县猿人保存了一具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还有额骨、顶骨和下颌骨残片及9枚牙齿<sup>[9]</sup>。南京汤山猿人的头骨化石包括大致完整的左侧面骨,右侧面骨的一部分,额骨、顶骨及枕骨残片<sup>[10]</sup>。据研究和县猿人及汤山猿人的形态特征既存在相似之处,又有差异。

关于重庆市巫山龙骨坡发现200万年前人类化石的问题,目前存在较大的分歧。1985年在龙骨坡遗址出土了一块下颌骨左侧残段,附带有P4-M1两枚牙齿,1986年又发现了一枚右上内侧门齿(后改订为外侧门齿)原作者于1991年将之命名为“巫山直立人”<sup>[11]</sup>。该结果一公布,即引起国内外的关注,并对两件石标本的属性及系统位置提出疑义。它究竟属于“人”还是属于“猿”?后有外国学者伍德(Wood, B)建议改订为“匠人”,不久又认为系不能确定种名的人属成员,此后各国不少化石人类学家对此鉴定提出异议。现一般认为此下颌骨残段应属于猿类。而那枚门齿的形态与直立人差别很大,而与智人相符,从而对这枚门齿的出土地层提出疑问。

1997年我国启动了寻找200万年和更早人类的“攀登项目”,我国的古环境适宜,并已发现了不少上新世和中新世的古猿,他们的生存环境也适合人类,我们期待着将来能找到200万年甚至更早的人类留在中国大地上的化石。

## 2. 智人阶段

智人一般分早期智人(Early Homo sapiens)和晚期智人(Late Homo sapiens),早期智也称远古智人(Archic H.s),以往还曾叫古人(Paleoanthropus)。晚期智人也称现代智人(Moder H.s),过去曾称之为新人(Neoanthropus)。前者距今约20万年,后者始于距今10万年。智人化石在全世界五大洲均有发现。

我国的早期智人化石都是在1949年以后发现的。1954年在山西襄汾县丁村遗址首先发现属于一少年的三枚牙齿(右上中门齿和侧门齿、右下第二臼齿),1976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块小儿顶骨残片。1956年在湖北省长阳县下钟家湾发现一块右上颌骨残段。1958年在广东曲江县马坝遗址发现一例中年男性的残破头盖骨化石<sup>[12]</sup>。70~80年代相继在贵州桐梓和大洞<sup>[13]</sup>、陕西大荔<sup>[14]</sup>、辽宁营口金牛山<sup>[15][16]</sup>和本溪庙后山<sup>[17]</sup>、山西阳高许家窑<sup>[18]</sup>、安徽巢县<sup>[19]</sup>以及周口店第四地点等遗址均发现有早期智人化石<sup>[20]</sup>。

马坝人是1949年后首次发现的属于早期智人的头盖骨,而大荔人的头骨化石则为中国早期智人的研究提供了最多的信息,其次当数金牛山人化石。对我国境内早

期智人化石的研究表明,从我国的直立人到早期智人的发展过程中,颅面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早期智人的颅穹增高、脑量增加、矢状脊及枕脊减弱、颧鳞变高、枕骨大脑窝与小脑窝的比例变小、以及突颌程度有所减弱等一系列形态的变化。同时仍存在一些与直立人相似的形态特征,如颧骨额蝶突前外侧面朝向前方、上颌骨颧突下缘及根部的特殊形态、扁平的鼻梁、接近水平的鼻额缝及铲形上门等,这些特征是从北京猿人到早期智人持续存在的。特别是印加骨的高出现率,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基因承继关系。

我国的早期智人也是在不断进化的,从形态分析可分为早晚两个类型,大荔人、金牛山人和巢湖银山人属早期类型的代表,而马坝人则代表晚期类型,马坝人的眼眶高而圆的特征,似有别于我国直立人和智人的传统形态特征,这可能意味着存在与外来基因的交流,尽管这种交流并没有形成气候。至于许家窑、丁村、长阳、桐梓及庙后山等遗址出土的人类化石,则因材料过于零碎或形态不典型而较难给予定论<sup>[21]</sup>。

我国境内晚期智人化石的出土地点多达30余处,加上时代相当但尚未发现人类化石的旧石器遗址,则有四十余处。遍布于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南和西南地区的17个省市自治区,最著名的晚期智人化石有山顶洞人、柳江人、河套人和资阳人等。

山顶洞人化石是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遗址发掘出土的。包括有完整的头骨3例、头骨残片3块、下颌骨4件、下颌残段3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还有脊椎骨、股骨残段、髌骨两块、髌骨一对及胫骨一对。这些人类化石可能属于8~10例个体。可惜这些标本的命运与北京猿人的化石标本一样在1941年被弄丢了,只留下当时复制的标本模型。好在魏敦瑞也详细地描述并研究了这些珍贵的标本,于1939年发表了关于山顶洞人的研究论著。在论文中他对山顶洞101号、102号及103号三例完整颅骨的研究结果,认为三者有较大的差异,101号老年男性颅骨的测量数值很像欧洲智人化石,但非测量性形态特征又应确立为原始黄种人;102号青年女性个体被认为属于美拉尼西亚人;103号中年女性个体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从而推断这是由一位老人和两位妻子组成的一个家庭,而且是从外地来此的部落成员,因受到当地居民的攻击而绝灭。

20世纪50代末,中国学者吴新智重新研究了山顶洞人化石的模型,他论证了山顶洞人3例颅骨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同时指出3例颅骨分别不同于欧洲类型、美拉尼西亚和爱斯基摩人的特征,而与中国人的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地安人相似,他们并不属于三个不同的人种类型,而是反映了具有原始蒙古人种的特征,3例颅骨之间相异之处,正是中国晚期智人在向蒙古人种演化过程中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所致。正因为他们身上某些现代蒙古人种的形态细节尚未完全形成,所以吴新智认为可将之视为“形成中的蒙古人种”<sup>[22]</sup>。另外山顶洞人遗址的石



制品虽然数量少而且不典型,但在山顶洞西部“下室”发现了当时人们已出现了陪葬装饰品的习俗,在遗骸周围出土有穿孔小石珠、穿孔海蚶壳等内容丰富的装饰品。

柳江人<sup>[23]</sup>和资阳人<sup>[24]</sup>的发现使我们对国内晚期智人的情况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即这些晚期智人都已具备了现代蒙古人种大部分的基本特征,如颧骨大而向前突出、鼻根点欠低陷、鼻骨低而宽、梨状孔宽阔、鼻前棘不发达、犬齿窝发育弱、有下颌门枕以及上颌门齿为铲形等。除具有一般的共性之外,在我国发现的晚期智人也已显露出形态发育的地区性差异,如柳江人头骨上无矢状脊、左右两侧颞鳞较高其顶缘呈弧形上突。这些特征不同于山顶洞人而与现代人更接近。中国境内晚期智人间的某些差异恰好表明,当时可能已存在至少两个不同的地方性类型,山顶洞人代表了我国北方地区的晚期智人类型,它可能与现代亚洲北部的蒙古人种及美洲蒙古人种相关联;而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华南地区晚期智人则可能与现代蒙古人种的南方类型相联系<sup>[25]</sup>。

我国境内不但出土有丰富的古人类化石,与人类起源相关的古猿化石也有重要的发现。20世纪30年代荷兰古生物学家孔尼华(Koenigswald, G. H. R. Vor)在香港的中药铺买的“龙骨”中拣出一枚巨大的牙齿,1935年将之定名为“步氏巨猿”(Gigantopithecus blacki)。为了解巨猿的共生动物群以及探讨巨猿在分类学上的位置等问题,裴文中于1955年冬组织考察队赴广西考察,证实了巨猿化石均出自洞穴堆积。巨猿化石地点包括广西省大新县黑洞、柳城巨眼洞、武鸣巨猿洞及湖北省建始龙骨洞等遗址。前后共发掘获得3例巨猿下颌骨和一千多枚巨猿牙齿,同时在广西、广东和湖北等省的中药材部门收集到240枚巨猿牙齿化石。至于步氏巨猿在分类学上的位置,目前在学术界虽然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一般认为巨猿是一个已绝灭的旁枝,不可能是人类或猿类的直系祖先<sup>[26]</sup>。

1975年以来,在云南禄丰石灰坝陆续获得了大量古猿的标本,包括头骨5例、上下颌骨40多件及牙齿一千多枚,特别是1980年发现了一具腊玛古猿头骨,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引起国际上的极大重视。经研究禄丰古猿化石有大小两型,最初将大型的定为西瓦古猿,小的被定为腊玛古猿,以后认为两者并不是种属之差别,而是两性的差别。1987年吴汝康将之更名为禄丰古猿(Lufengpithecus),认为他们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或与之接近的类型。禄丰古猿的发现表明,包括云南禄丰在内的我国华南地区应该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sup>[27]</sup>。

由于分子生物学更深入地介入人类学的研究,美国的凯恩(Cann)等几位遗传学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通过对各人种妇女细胞中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mtDNA)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所谓“夏娃说”,即现今世界各大洲所有的现代人的祖先,均源于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群妇女<sup>[28]</sup>。具体到中国就是非洲“夏娃”的后裔来

到中国大陆并取代了这里的原住民——北京猿人的后代。这一观点在我国的学者中引起很大争议。

中国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特别是1949年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对中国古人类谱系的认识,走过了一条由简单的直线发展为一套复杂的人类进化图景。禄丰古猿的发现表明中国华南地区应该也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而对中国出土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研究,证明他们之间在体质特征上的承继关系是清楚的。如扁平的面部、上面高较短、鼻梁欠隆起和铲形门齿等特征基本上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研究中也发现有少数特征在中国化石库中显露出一不怎么和谐的“音符”,但与中国化石古人类的共性特征相比,在数量上占的比例是很少的。可以这样推测,中国的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虽然与外界也存在过交流,但这种基因交流量不大,与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主流相比是次要的。因此,中国的古人类进化图景是循着一条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模式进行的。这一模式也得到来自古文化方面证据的支持,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也自成体系,未发现任何来自非洲、近东或印度等地旧石器的影响,呈现出与西方旧石器文化不同的特征。中国已有的古人类化石及旧石器文化都有力地支持中国的现代型人类起源于本土。而且早在直立人化石上就有可能与蒙古人种祖先类型存在遗传学上联系的基因——铲形门齿。经早期智人到晚期智人,在向现代蒙古人种演化过程中体质发展的脉络是清楚的,中国大陆是蒙古人种主要发祥地之一。

## 二、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学研究

我国史前时期古人类学的研究是与现代考古学同时在上世纪20年代传入的。1921年在前面已提到过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主持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以及尔后在甘肃发掘众多的彩陶文化及其他遗址的同时,就采集了一批墓葬出土的人类遗骸。后经步达生研究并于1928年发表了研究报告<sup>[29]</sup>。抗战期间,日本人在热河赤峰(今内蒙古赤峰市)红山遗址第二住地的墓葬时,也采集了一些人骨,由三宅宗悦写的研究报告<sup>[30]</sup>。中国学者在进行考古发掘时也非常注意收集古人类学的材料,当年李济先生主持发掘安阳殷墟遗址时,就采集了大量的人骨资料。

1949年后考古工作得到迅速的发展,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夏鼐主持下,一如既往地坚持采集各个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如发掘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阵、华县元君庙及河南陕县庙底沟等史前遗址时,对墓葬出土的人骨均妥为采集保存。这些材料后由颜真主持研究并发表了研究报告。但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各地考古工作人员对古人类学资料重要性的认识水平不平衡,许多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被忽略了。随着考古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新石器时代以及各个历史时期

的古人类学资料重要性的认识也得到提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各地考古部门都注意对古人类学资料的采集与研究。迄今已发表的研究论文及资料,使我们对新石器时代,人种地理分布的概况可以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对历史时期古居民的体质状况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

#### 新石器时代人种的地理分布

1928年步达生将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甘肃的马家窑、马厂、半山、齐家、寺洼和沙井等遗址出土的人骨材料合在一起研究并著文发表。虽然他将不同地区,时代也不同的遗址出土的人骨合并一起进行处理,似并不妥当,但以后所获得的材料对之进行检验,其结论并无明显的差错。步达生认为甘肃河南合并组的体质特征具有“东方人特征”(the Oriental Particularity)并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祖先类型。实际上他所谓的“东方人特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或东亚蒙古人种。到20世纪60年代颜间先后发表了对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报告<sup>[31][32]</sup>。他依据在仰韶文化居民中普遍具有低眶、阔鼻和突颌等特征,认为可与南亚蒙古人种相联系。在研究山东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人骨的报告中,据大汶口文化居民中普遍存在头骨枕部人工畸形(扁头)及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的习俗,而提出大汶口文化居民与南太平洋的玻利尼西亚人相关联的论点<sup>[33]</sup>。随着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人骨资料的逐渐增多,对我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种族分类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得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开始于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种分化进程到新石器时代得以充分的展现。随着更新世最后一个冰期的终结,晚期智人祖先的后裔,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而寻找并扩展他们的生存空间。同时,由于气候逐渐转暖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终于爆发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农业及家畜饲养业的诞生,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从而导致人口数量的剧增。而当时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古代居民群体,由于一些高山、河流、湖泊、海洋和沙漠等自然屏障的阻隔,相互间处于一种相对隔离的状态。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各群体内部人类自动遗传过程的发展,强化了人们体质上的地区性差异,同时各自创造出具有各自独有特色的地区性文化类型。分析已发表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学资料,大致已形成依长江天堑和燕山山脉两大自然屏障为界的三个人种地理分布区,即北方及东北地区、黄河流域和华南地区<sup>[34]</sup>。

黄河流域或称之为中原地区,该地区自燕山山脉以南至长江以北,包括江淮地区及江汉地区的广大地域。在该地域内已掌握的人类学资料较为丰富,黄河上游有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人骨资料除步达生于1928年发表的以外,主要还有青海乐都柳湾<sup>[35]</sup>和民和阳山<sup>[36]</sup>两批颅骨资料;

仰韶文化的人骨资料有西安半坡、临潼姜寨<sup>[37]</sup>、宝鸡北首岭、华阴横阵<sup>[38]</sup>、华县元君庙和河南长葛等<sup>[39]</sup>处;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人骨资料,来自山东宁阳大汶口、曲阜西夏侯、邹县野店<sup>[40]</sup>、兖州王因<sup>[41]</sup>和广饶傅家<sup>[42]</sup>等遗址,还有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sup>[43]</sup>和新沂花厅遗址;江汉地区的有湖北房县七里河屈家岭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sup>[44]</sup>,四川东部巫山县的大溪文化也收集了部分人骨<sup>[45]</sup>。

关于仰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最初据半坡、北首岭、元君庙等遗址出土人骨的研究认为他们一般具有颅顶矢状缝简单、圆钝的眶形、高而宽且略向前倾的颧骨、不发达的鼻前棘、鼻梁低矮、犬齿窝发育弱、面部扁平及铲形门齿的出现率高等现代蒙古人种常见的形态特征;而颅骨的测量分析呈现为中等长的颅型结合高颅的性质、普遍的阔鼻倾向、中等偏低的眶型及明显的齿槽突颌等性状,又显示出与现代蒙古人种的东亚和南亚类型比较接近,并以接近南亚类型的程度为大。对这一观点,有人认为所谓与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那些特征,如阔鼻低眶和齿槽突颌等,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就是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的证据。考察中国晚期智人祖先山顶洞人和柳江人都具有较阔的鼻型(山顶洞101号的鼻指数55.2、102号55.9,柳江人58.5,齿槽面角均属突颌,眶指数均为低眶型。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颅面形态上的这些特征,更可能是继承了智人祖先身上的某些较原始的形态特征。并且上述那些较原始或较落后的形态特征,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为至今这些形态特征依然保留在低纬度地带的居民中。另一方面这也是人类体质演化进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的反映<sup>[46]</sup>。

对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类型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形态特征基本上属于蒙古人种,同时又与生活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玻利尼西亚人接近,与仰韶文化居民不同,两者属于不同的体质类型;另一种意见指出,以形态特征的比较分析可证明。玻利尼西亚人颅骨上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在大汶口文化居民的头骨上并不存在,不应归入属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与蒙古人种之间的中间类型的玻利尼西亚人。实际上大汶口文化居民与仰韶文化居民之间在形态特征方面至具有较多的形态一致性,他们之间在体质上虽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未超出同种系的水平,大汶口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应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它与仰韶文化居民在体质上应属于同一种系下地区不同的两个地方性族群。此外也曾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居民与现代华南人比较接近,但后来改变观点,也认为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相似。但大汶口文化居民中盛行的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及头骨枕部人工畸形的习俗,在仰韶文化居民中未见<sup>[47]</sup>。

分布于湖北江汉平原和四川东部峡江地区的大溪文化及屈家岭文化的古人类学资料不很丰富,从四川巫山大溪、湖北房县七里河和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出土的人骨标本分析,这两种新石器时代先民的人种类型与中原

地区相类似。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古人类学的资料,除步达生研究发表的甘肃河南史前人骨之外,颜间曾研究发表了两例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青海省乐都县柳湾遗址发掘出土了一批人骨资料,其中大部分来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墓葬、其余为半山类型墓葬和齐家文化墓葬的人骨。此外在青海民和县阳山墓葬遗址和甘肃永昌县鸳鸯池遗址采集的人骨都发表了研究报告。马家窑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表现为,具有中长颅型结合高颅型和狭颅型,面宽较窄等颅面形态特征,更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且与现代华北类型较为相似,从而显示出与仰韶文化居民存在差异。

综合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居民的体质特征,虽然总体上均显示出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但在上游甘青地区、中游的中原地区和下游山东地区三部分居民在体质上仍存有细微的地区性差异。在仰韶文化居民中更多地保留了一些晚期智人祖先较原始的颅面形态。而大汶口文化居民的颅型较仰韶居民更高、面部也较高且宽,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性状更突出,同时也存在不同的习俗。

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年代略晚于仰韶文化,一般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在甘青地区的延续和发展,系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或是仰韶文化的西支,两者在体质上的差异,可能是人类进化机制的作用,也可能是西渐的仰韶人与当地原住民融合产生的结果。

曾有外国学者推测,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居民,是公元前5千年左右来自印支半岛和平文化中心地区边缘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居民,是这些南方人迁徙北上,越过秦岭进入渭河流域后,排挤或同化了当地的原住民<sup>[49]</sup>。但是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及古人类学材料两方面,均找不到能支持这种推论的证据。相反,无论是人种学的材料还是考古学文化,都可以证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其自身的渊源和发展序列。

北方地区,包括燕山山脉(今内蒙古长城地带)及以北的整个东北地区。这里很早就多民族出没聚居并相互融合的地域,也是北方草原牧业文明与中原农业文明相互接触的地带。风调雨顺的年景,农业地区和牧业地区居民间进行着正常的互通有无的交往,遭遇天灾频繁的时候,为争夺生存空间,北方牧民就入侵农业地区,这就造成该地区的种族成分较为复杂。该地区已知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学资料为数不多。这一区域的北部只有黑龙江省东部兴凯湖沿岸新开流遗址<sup>[49]</sup>、黑龙江省西部嫩江流域昂昂溪遗址<sup>[50]</sup>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遗址采集了人骨资料<sup>[51]</sup>。大南沟遗址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小河沿文化,该遗址出土人骨的体质特征,表现为具有以圆颅、高颅结合宽而扁平的面部。这些形态特征呈现出与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均相关联的性质。另新开流和昂昂溪两地出土的颅骨也具有相同的特征。这种以圆颅、高颅、阔面和扁平的面部为基本特征的古

代居民,是东北地区远古时期最主要的土著居民类型。依其颅面形态特征,被称为“古东北类型”。该区域南部,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到晋北和冀北一带长城沿线的同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与上述古东北类型略有差异。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查布盟察右前旗内黄旗海南岸的庙子沟遗址仰韶文化晚期的人骨为代表的居民,其体质特征为偏长的中颅型结合高颅和狭颅,偏低的中眶型,中等的鼻型和中上面型,这些特征的组合,既显示出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而明显扁平的上面部又反映出具有北亚蒙古人种的性质。有人将具有这种特征组合的居民称之为“古华北类型”<sup>[52]</sup>。

长江以南的广大华南地区,因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除一些贝丘遗址外,其他遗址很难有保存较好的人骨资料。已见报道的有广西桂林甑皮岩、广东增城金兰寺和佛山河宕、浙江余姚河姆渡、上海崧泽、南京北阴阳营和福州县石山等遗址采集的人骨资料。

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人骨,据报告该组颅骨的体质特征有些接近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质,但较现代南亚种族有更小的颅指数,较大的面宽和鼻宽。实际上该组颅骨的颅面形态与华南新石器时代居民有更多的共性<sup>[53]</sup>。

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人骨采自该遗址的第三文化层的墓葬,该文化层的文化特征显著,是分布于宁绍平原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时间与马家浜文化相当。共清理了13座墓葬,多数系未成年个体,骨质保存欠佳,只采到两例较完整的头骨。据研究其主要的体质性状为长颅型结合高、狭颅型,鼻骨宽而低平,小眼眶,是面部低矮及明显的齿槽突颌,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较相似,同时也有一些类似赤道人种的性状<sup>[54]</sup>。

马家浜文化的古人类学资料,只有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人骨有过简单的报道,结论是该组颅骨的种族特征具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性状<sup>[55]</sup>。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的人骨资料,只发表了下颌骨的研究报告,指出该组下颌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与安阳殷墟出土人骨相去较远,而接近当地现代组<sup>[56]</sup>。

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只采集了两例不完整的颅骨,研究报告认为该组颅骨,在形态上一般地显示出具有蒙古人种性质<sup>[57]</sup>。

广东佛山河宕遗址为一处贝丘遗址,该遗址出土有几何形印纹陶,过去曾认为属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对石峡第三期文化的认识,几何形印纹陶的繁盛系广东地区夏商时期文化的显著特征,而河宕遗址的年代与石峡三期文化相当。该遗址出土颅骨的体质特征,显示出既具有如宽大的颧骨、低平的鼻骨、鼻根凹陷浅、犬齿窝发育弱及铲形门齿等蒙古人种的性状;也有一些如长而高狭的颅型、上面部低矮、垂直颅面指数小、阔鼻、鼻骨角小及齿槽突颌等,常见于现代赤道人种或现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南亚类型的特征<sup>[58]</sup>。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县石山遗址的人骨,出自该遗



址的中、下层墓葬。该组颅骨的形态特征,表现为长颅、低面、阔鼻、垂直颌面指数小及明显的齿槽突颌等,显示出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相似<sup>[59]</sup>。

上述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中的既与南亚蒙古人种接近,又与赤道人种相似的种系特征,其实并不鲜见,对比一下智人祖先的形态特征,就可以发现类似的性状在中国晚期智人中就普遍存在。因此,这些类似赤道人种的特征,未必就意味着在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中具有赤道人种成分的混杂。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较落后的体质性状系从我国境内的晚期智人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但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这种体质性状与黄河流域同时期的居民存在明显的差异,这说明两个地区的居民具有不同的种族渊源。

进入公元前三千年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被新崛起的龙山文化所取代;甘青地区在马家窑文化之后则有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目前已掌握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学资料,远不如前阶段的系统。关于龙山文化的人骨资料已发表的研究报告屈指可数。黄河流域中下游有豫西陕县庙底沟二期文化墓地<sup>[60]</sup>、山东诸城呈子<sup>[61]</sup>和兖州西吴寺<sup>[62]</sup>等遗址出土的人骨,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墓葬人骨,仅有齐家墓地的两例颅骨及柳湾遗址的部分齐家文化墓葬出土的人骨。

龙山文化居民体质类型,大体是与同一地区前期居民相似,但也有一些变化。以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为例,在他们身上先前遗留在仰韶文化居民中的一些较为原始的形态特征已经消退,其体质性状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更为接近,似处于大汶口文化居民和仰韶文化居民之间的中介位置。呈子遗址和西吴寺遗址的龙山文化居民与大汶口文化居民具有明显的承继痕迹,只是在龙山文化居民中未观察到曾在大汶口文化居民中盛行的头骨枕部人工畸形和拔除一对上颌侧门齿的风俗。

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居民的体质特征,继续保持了该地区前一阶段马家窑文化居民的基本性状,

关于头骨枕部人工畸形、拔牙和颌骨变形等特殊风俗。头骨枕部人工畸形和拔牙的风俗,最初见于大汶口遗址的人骨中,以后在山东境内和江苏北部的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人骨中发现普遍存在这种风俗习惯。一般盛行于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推测此种风俗可能与表示成年的礼仪相关,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开始衰落,至龙山文化兴起后,此种习俗在原先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即消失。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地区是这种习俗特别是拔牙风俗的发祥地和中心地区。由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拔牙风俗推断,此种风俗沿两条路线向外传播。向南越过长江后向东南沿海一直抵达珠江三角洲,在苏南常州圩墩遗址、福州县石山遗址和广州佛山河宕遗址的出土人骨中均存在拔牙习俗;另一方向是沿江淮地区向西,在安徽北部亳县及皖西鄂东的薛家岗文化的居民中也发现有拔牙习俗存在。只是拔牙的齿组有所变化<sup>[63]</sup>。至于下颌骨变形的特殊风俗,目前只见于鲁南苏北的几处大汶

口文化遗址中。这是一种因口中长期含一石制或陶制小球的习惯,使下颌骨两侧臼齿部位受挤压磨损而变形。这种习俗的含义尚不清楚<sup>[64]</sup>。

上述关于史前时期生活在我国大地上先民的种族概况,充分证明中国史前居民的人种演化,基本上是在单一蒙古人种主干水平上发生发展的。迄今尚没有任何古人类学的材料和古文化遗物可证明曾发生过外来移民大量侵入替代原住居民的迹象。我们的祖先既非来自西方,也不是北上的南亚移民,而是自古就在生活繁衍在这块大地上的土著居民。即使有过与其他地区的基因交流,那也是极微弱的,没有留下明显的痕迹。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人种地理分布及演化规律明显地存在地区的延续性。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三个区域性群体,北方和东北地区,因很早就多民族(或部族)杂处交汇地带,其种族的构成也较复杂;黄河流域基本上已形成由东亚蒙古人种为主的居民族群:华南地区则居住着与现代南亚蒙古人种接近的群体。进入公元前三千年后,反映在考古学文化类型上也形成三大不同的文化群体。在黄河流域出现以篮纹和方格纹为主的黑陶和灰陶,器形以实足三足器、袋足器和圈足器为共同特征的龙山文化:北方地区则有以压印“之”字纹和篦纹的陶器,并伴存有斜口罐及细石器为共同特点的文化群体;华南地区出现以几何形印纹陶和有段石器为共同特征的文化群体。考古学文化群体的分布地区,与人种类型的地理分布区域大体上相对应<sup>[65]</sup>。

### 三、夏、商、周时期

夏、商、周三代正是以华夏族为中心的我国古代各族发展壮大并不断交流融合的第一个高峰期。观察研究这一时期的古人类学材料,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差异,在新石器时代各个遗址中出土的人类遗骸,虽然保留了某些从智人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较落后的体质性状,但就某个遗址甚至某一地区所呈现出的体质特征来说还是较为单纯的。然而在青铜时代遗址墓葬出土的人骨中,人种混杂的现象就已是十分普遍事情了。这种混杂,不仅表现为在同一个体上可以反映有两种不同种族类型的体质因素,而且还表现为在同一群体中便有可能存在两种差异很显著的属不同种族类型的个体。这是进入青铜时代后,不同地区人类群体之间的频繁迁徙和相互交融的反映。

迄今已知的与夏人、商人和周人有关的人类学材料并不很理想,属于青铜时代早期的人类学资料目前已掌握的很少,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约相当于青铜时代早期阶段。此外,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和河北蔚县三关两处墓葬出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颅骨资料,时代约与夏纪元相当。若论探索夏族的起源这两处据文献记载的夏朝的活动中心地域过远。对夏文化的发祥地,一般倾向于应在今晋南和豫西地区,河南偃师二里头遗

址是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发掘地点之一,可惜至今尚未从该遗址获得可供研究的人类遗骸。晋南地区在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发掘了大量墓葬,采集了一些可作研究的颅骨。其体质性状呈现出可能为一组单元(单一蒙古人种)多类型的混合群体,基本上可归属“古华北类型”,然其偏小的垂直颅面指数又显示出含有某些南方蒙古人种的因素。与邻近地区时代接近的人类学资料作比较,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居民在体质上存在一定的基因联系。晋南地区是传说中尧、舜、禹的中心活动区域,历来有“夏墟”之称,那么夏族祖先的体质类型很可能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及陶寺类型的古居民相联系<sup>[66]</sup>。

殷商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很广,东起渤海之滨,西及陕西、四川,北至辽宁西部,南抵江西和湖南中部。在星罗棋布的殷商遗址中,古人类学资料的积累却很少。关于商人体质信息主要来自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自盘庚迁殷至武王伐纣,这里是整个商代后期的都城所在地,历八代十二王共273年。殷墟的发掘是我国以至世界考古学领域中重大的发现之一。自1928年开始运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考古发掘以来,它已为世人在研究商代甲骨文、青铜器、陶器、建筑、埋葬制度,社会性质以及手工艺制作水平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其墓葬出土的人类遗骸,更是我们了解商代后期居民种系成分的宝贵资料。

殷墟的古人类学资料,来自两类墓葬。一类出自西北岗殷代王陵区众多的杀殉祭祀坑,另一类系王陵区以外的氏族墓地所出。自1928年至1936年间由祭祀坑所采集的头骨数量近千,这些标本在战争的情况下几度搬迁,由南京而云南昆明,而四川南溪李庄,抗战胜利后搬回南京,最后运往台湾。经多次搬迁,使标本遭受很大的损失。最后在台湾整理时,完整的可供测量的头骨仅余398例。殷墟氏族墓地的头骨,系1949年以后发掘采集的。通过对这两批人骨材料的研究,使我们得以对生活在殷代后期都城居民的种系构成有较全面的了解。

祭祀坑中死者的身份系商王在祭祀祖先时作为人性被杀殉的奴隶,男性牺牲均是身首分开埋葬,而女性牺牲则是全尸埋葬。对祭祀坑出土颅骨种系成分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意见,即同种系说和异种系说。同种系说认为祭祀坑头骨的种系归属是单一蒙古大人种主干下多类型的复合体,并没有其他大人种成分的混入。其所反映在个体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分别属于蒙古人种的东亚、北亚和南亚等不同类型所造成的<sup>[67]</sup>。异种系说则认为这批头骨的种系成分虽然以蒙古人种为主,但同时也存在有欧罗巴人种和尼格罗人种的血统。联系到我国旧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古人类学资料的分析研究,同种系的观点似更接近实际一些<sup>[68]</sup>。

商王用于祭祀的奴隶,是统治者征战四方时掳掠的异族战俘和人民,不同人种类型的居民在殷墟遗址中共存的现象,正是与商王向四邻用武力扩张相吻合的,同时也反映了殷商时期人口流动的规模和范围已相当可观。

殷墟氏族墓地亦即王陵区以外的中、小型墓葬,以形制和随葬品分析。具有一定规模的中型墓葬,一般均有成组的礼器,甚至殉人,他们的身份应有别一般小型墓葬的平民,他们可能是受封的贵族,与王族关系密切,或本身就是没落的王族成员。出自这些墓葬的颅骨是探索商代王族人种类型及商族起源的十分重要的资料。

综合祭祀坑和王陵区以外氏族墓地这两类墓葬出土颅骨的形态特征,大致可区分为三个蒙古人种的亚种:1,东亚蒙古人种类型,2,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和东亚蒙古人种相混合的类型,3,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的类型。其中以属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数量最多,“古东北类型”次之,接近南亚蒙古人种类型的数量最少。以此推测,生活在商代后期政治中心地区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而占优势的是东亚蒙古人种类型的群体,他们可能是当地的原住居民。来自南方的人为数较少。值得注意的是殷墟氏族墓地中出土的头骨,其大部分个体呈现出是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另外在殷墟中小型墓葬的出土人工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即少数出自中型墓葬颅骨的形态特征,表现为具有很阔的面宽,颅高中等或偏低,颅骨整体较大,鼻骨较隆起,呈现出既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又具有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特点。这种带有北亚蒙古人种体质因素的居民,不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前期原住居民所固有的,一般来说他们主要分布于今长城沿线和东北地区,一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古东北类型”便属此类。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推测,假如殷墟中小墓中的那部分以北亚、东亚蒙古人种两种成分相结合为特征的个体,能够代表殷商王族人种类型的话,那么商族的祖先很可能与北方地区的某些古代居民具有更直接的种系渊源关系<sup>[69]</sup>。

文献记载商人自契至成汤凡八迁。《世本》载“契居蕃”,“昭明居砥石”。对“蕃”和“砥石”地理位置的说法不一。有人据《淮南子·坠形训》“辽出砥石”的记载,及高诱的注“砥石,山名,在塞外,辽水所出”,认为商人起源于辽河上游。也有据《诗·商颂》中“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认为商人崇拜鸟图腾,而崇拜鸟图腾以及祖先为卵生的神话传说多流行于古代东北诸民族中。从殷墟出土的人类学资料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商人的祖先类型源于北方并不是不可能的。

殷墟祭祀坑出土的人骨存在“同一墓(祭祀坑)中出土的头骨大抵属于同一类型”的现象,据此推测殉葬的牺牲可能是以不同族系分别杀殉埋葬的。

关于周人的体质人类学材料,目前已掌握的为数不多。在陕西主要有凤翔南指挥西村遗址的先周和西周墓葬<sup>[70]</sup>,宝鸡北吕周墓<sup>[71]</sup>及长武碾子坡遗址的包括先周、西周和东周墓葬<sup>[72]</sup>。在山西有天马-曲村遗址的西周墓葬<sup>[73]</sup>。总的来说这几处遗址出土豹人骨所反映出的体质特征基本相似,普遍具有中颅、高颅和狭颅相结合的颅型,中等偏低的面型,中鼻型或阔鼻型。偏低的眶型和明显的齿槽突颌等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和南亚蒙古人种



接近的特征,而以接近东亚蒙古人种的性状为主。以碾子坡和曲村这两处遗址出土颅骨的比较,呈现出两者相互接近的程度优于相邻地区其他各古代族群,这反映了两两者之间可能存在有较亲近的基因联系。碾子坡先周晚期颅骨的形态特征与甘肃四坝文化火烧沟类型居民也存在较为密切的基因关系,有人认为火烧沟类型可能与羌人相关,这或许为我们探寻周人的渊源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时代和地域都很接近的长武碾子坡遗址的先周或西周居民与凤翔南指挥西村遗址的先周和西周居民的体质特征却显露出一些差异,主要表现在后者的面宽明显窄。这种狭面人群究竟来自何方,目前尚未找到合理的答案。

属于东周时期的古人类学材料,还有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人骨。目前所见到的都是贵族墓葬的人骨,如由著名的曾侯乙墓采集的人骨,就包括有男性贵族墓主和女性殉葬人的骨骼。两者在体质是基本上可归属同一类型,均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sup>[74]</sup>。

四川成都指挥街东周墓葬出土的人骨,可能接近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sup>[75]</sup>。另外在四川发现的明代“焚人悬棺”颅骨的人种表现出具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特征<sup>[76]</sup>。

#### 四、边远地区各族的古人类学资料

探索历史上古代各族的源流,也是人种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之一,考古学文化、人种学及族称三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一种考古学文化可以是某一民族所创建和使用的,也不排除为若干民族所共有的。而一个联合壮大起来的民族实体,有可能包含若干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人种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相类似。虽然每个民族都以一定的人种类型为其遗传基础,但在一个民族中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种类型,或某一入种类型分布于不同民族中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尤为常见。虽然对各考古学文化的人种学构成的研究,可能对探索某些族属的源流提供有益的帮助,但不能过高地估计其作用,人种学的研究不可能独立解决族称问题。人种学研究必须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结合起来研究,目前我国古人类学工作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只刚刚开始作了一些探索。现所掌握的边远地区的古人类学材料主要分布在燕山南北的广大北方地区及西北新疆地区,在西藏只有个别遗址的资料。

在内蒙古黄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和乌兰查布草原,发现了许多既有地方特色又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相联系的文化遗存,以及带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化色彩的古代遗址。其中可提供人类学材料的主要有朱开沟<sup>[77]</sup>、桃红巴拉<sup>[78]</sup>、崞县窑子、毛庆沟和饮牛沟等遗址<sup>[79]</sup>。朱开沟遗址的年代自龙山文化晚期经夏延续至早商时期,其居民的体质特征主要与现代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同时也

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与周围农耕文化居民之间的关系密切。

桃红巴拉和崞县窑子两处遗址的先民,一般具有扁平的面部和宽阔的颅型等接近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而地理位置偏南的毛庆沟和饮牛沟等遗址的居民,其形态特征则更多地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这几处遗址的时代约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通常被认为可能与匈奴或林胡、楼烦有关。我国学者对匈奴族体质类型的演化发展做了较深入的探索。

关于匈奴族的种族类型问题,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和人类学工作者关注。自王国维在《西胡考》中依据《晋书·石季龙传》中对西晋十六国时期羯胡容貌的描述。认为既然羯胡的外貌是“深目、高鼻、多须”,而羯胡是南匈奴的后裔,因此匈奴也就应是胡人状的。而后麦高文在《中亚古国史》中据此引申出匈奴人早期的祖先近于“白种人”。然而在我国发现的有关匈奴的古人类学材料无论是上述之桃红巴拉、崞县窑子,还是青海大通发现的随葬有“匈奴归仪亲汉长”印鉴墓葬出土的人骨资料都证明匈奴族属于蒙古人种。另外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地区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诺音乌拉匈奴墓出土的人骨也属蒙古人种,前苏联人类学家杰别兹将这类具有中、长颅型结合低颅性质,且上面高较高特征的人,称之为古西伯利亚类型。来自东欧的公元4~5世纪的匈奴人墓葬出土的人类学材料,呈现出具有欧罗巴人种和蒙古人种混合的性质,但也有个别墓葬的人骨为较纯的古西伯利亚类型,这些古西伯利亚类型的人,应该就是西迁后留在东欧地区的匈奴人的后裔。同时,在东罗马和哥德族史学家笔下所描述的匈奴人形象,如矮个子、扁鼻子、小眼、扁脸和胡须稀少等特征,无疑都是典型的蒙古人种的性状。据已发现的匈奴族的人类学材料,起源于鄂尔多斯的匈奴之祖先的人种类型,即匈奴的主体居民主要是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并含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群体。当匈奴部落联盟兴盛扩展时,包容了贝加尔湖地区和诺音乌拉等地属古西伯利亚类型的群体。遂在匈奴族中形成南北两部,后者即为北匈奴的主体居民,南北匈奴分裂后向西迁徙的就是这一部分。因此,南北两部分在种族上的差异也是导致匈奴部落联盟最终走向分裂的潜在因素<sup>[80]</sup>。

据文献记载,活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的,大致有匈奴、东胡和肃慎三大系统。目前在该地区所发现的,商周时期至汉代的古人类学材料,据分析研究依形态特征可划分为三或四个种族类型群体。各群体的分布基本上与地域分别相平行。

匈奴族的势力范围以东为东胡的活动地域,文献记载乌桓与鲜卑均属东胡系统。目前有人认为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及河北北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东胡有关,而内蒙古北部呼伦贝尔盟的完工和扎赉诺尔遗址、吉林泰来平洋墓地及内蒙古东南部昭盟的南扬家营子遗址等与鲜卑相关。那么东胡系统居民所包含的种族

类型就较复杂。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的种族类型主要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sup>[81]</sup>。而完工、扎赉诺尔的居民的体质特征可分为两个类型,一类与北亚蒙古人种接近,另一类具有东北亚和东亚蒙古人种混血的性质,南杨家营子的居民则主要接近北亚蒙古人种<sup>[82]</sup>。东胡和匈奴不但在地域上相邻,并存在相互交错杂处的情况。东胡曾被匈奴兼并,但当南北匈奴分裂后,东胡系的鲜卑人趁势占领北匈奴故地,大量未迁走的匈奴人“皆自号鲜卑”,史籍上常见有“胡父鲜卑母”或“鲜卑父胡母”的记载。这说明民族间的婚媾融合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在这一地区所存在的种族类型较繁杂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但这就给我们在种族类型和族别的研究增加了难度。如果说平洋、扎赉诺尔、完工和南杨家营子等遗址确与鲜卑族有关,那么而后在鲜卑族南移的过程中又不断吸收了新的成分加入,如南杨家营子遗址中出现的脸形较狭的体质因素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sup>[83]</sup>。

北方地区青铜时代的古人类学资料除上述可能与匈奴鲜卑有关的部分外,比较重要的还有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人骨资料。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辽河流域的一种重要的早期青铜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600年。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各遗址中,以大甸子遗址收集的人骨资料较为丰富。大甸子组颅骨的形态特征分析,该处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是一组同种系多类型的复合体,第一组是具有中长颅型伴以高颅型和狭颅型,中等的上面高和中等的颧宽,鼻型、眶型和面部扁平度均为中等,接近现代东亚蒙古人种;第二组的形态特征为圆颅型结合高颅型和中颅型,面型高而阔,上面部较扁平,鼻型稍宽,中低眶型及平颌型等,显示出既与东亚蒙古人种接近又有某些与北亚蒙古人种相似的体质因素;第三组是所有存在枕部人工畸形(扁头)的颅骨,分析该组颅骨的校正值,其体质特征应与第二组相似。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组的居民有可能与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居民相关联<sup>[84]</sup>。

此外,还有辽宁省彰武县平安堡遗址出土的高台山文化<sup>[85]</sup>,康平县顺山屯青铜时代文化遗址<sup>[86]</sup>,本溪市庙后山青铜时代的洞穴墓葬<sup>[87]</sup>,吉林省西团山文化的颅骨资料<sup>[88]</sup>,其体质特征均表现出主要与东亚蒙古人种相似,但也有某些特征可与现代北亚蒙古人种相对比。

沈阳郑家洼子东周墓葬出土的入骨,其体质特征具有短而很高的颅,极扁平的面部,反映出有蒙古人种西伯利亚类型和东亚蒙古人种相结合的特点<sup>[89]</sup>。

吉林省九台市关马山战国墓的人骨资料,其形态特征表现出与东亚和东北亚两个蒙古人种支系存在更多的接近关系<sup>[90]</sup>。

内蒙古长城地带和东北地区青铜时代至汉代各遗址出土颅骨的形态特征,据分析至少可分为三或四个种族类型群体,从地理分布看,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的群体主要分布在燕山长城地带,东北地区早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东亚、北亚和东北亚三类

蒙古人种支系相互参透的种族类型,发展至商周时期这种杂居混合的趋势有增无减。

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人骨资料,以甘肃省玉门市火烧沟遗址出土的一批人骨标本较为重要,该遗址的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或早商时期。该组颅骨的体质特征与殷墟中小墓组、甘肃史前组都比较接近,同时与现代华北类型也颇相似。有人推测火烧沟类型的文化可能与起源于西北地区的羌族相关<sup>[91]</sup>。

西藏的古人类学材料直到近年才在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中采集了少量人骨。据研究其形态特征与东亚蒙古人种近似,与莫兰特研究区分的西藏A、B两个组相比较,似处于两者的中介位置<sup>[92]</sup>。

此外,出土于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下西河潘家梁墓地的卡约文化人骨,体质上具有一些独自的特点,与现代藏族B组有很近的形态学联系。这种体质类型在类型学上的变异,是否与其他亚洲蒙古人种地域类群有所区别,而可能成为亚洲蒙古人种的一个特殊变种,是值得注意的<sup>[93]</sup>。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地区,在海上交通未开展前,新疆就成为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和东西文明的交流场所。从种族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里是东西方人种的接触地带。由于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地上地下保存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进入新疆掠走大量文物的同时,也带走了一些与文物同时代的人类遗骸。后来由基思和马洛夫等学者进行了研究,但材料不多且地点分散。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我们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新的古人类学材料。已发表的较有价值的人骨材料有孔雀河古墓沟墓葬、阿拉沟丛葬墓、焉不拉克墓地、楼兰古墓、昭苏土墩墓、桑普拉丛葬墓<sup>[94]</sup>以及最近几年在尼雅遗址和克里雅河流域圆沙古城等处出土的人骨或干尸<sup>[95]</sup>。

迄今为止,在新疆地区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和确切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学材料。据已知的颅骨资料分析,新疆地区是蒙古人种和欧洲人种在我国境内的接触地带。但目前尚缺乏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存在过人种交流的实物证据,因此,河西走廊似为早期东西方人种在我国境内的地理分界线。西方人种出现在中国的时间较晚,大约到青铜时代晚期始有来自中亚的古欧洲人种进入新疆地区。

对孔雀河古墓沟人类学材料的研究,证明至少在公元前16世纪就有相当发达物质文化的古欧洲人种类型的居民生活在罗布泊地区。到公元前8~5世纪,又有欧洲人种地中海东支的印度-阿富汗类型的人进入该地区,同时也有少量蒙古人种的移民进入新疆。在阿拉沟丛葬墓和焉不拉克墓地出土的人骨材料中就存在欧洲人种和蒙古人种混杂的现象。在新疆西部伊犁河上游发现的两汉时期的乌孙和塞族墓葬出土人骨的人种类型,呈现出

以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同时也有少量蒙古人种的移民,特别是在属乌孙族的土墩墓中。这些蒙古人种的移民很可能与汉代宗族公主细君下嫁乌孙国王的联姻有关,因公主下嫁时带去大批随从,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留在了当地。

就新疆地区现有古人类学材料的整理研究,发现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即在古丝绸通道南线所发现的人类学材料分析,显示出其人种类型相对较单纯,主要是欧洲人种的印度—阿富汗类型,或有不同欧洲人种成分的混杂,而未发现有与蒙古人种共存的情况。而东西方人种交汇的现象在古丝绸之路的北线则显得较为活跃<sup>[96]</sup>。

有一种意见认为,蒙古人种移民进入新疆地区的时间约在公元前6世纪。实际上中原地区与新疆地区早期人类发生交流的时间应远早于公元前6世纪。目前虽然我们还没有掌握直接的人类学证据,但已发现一些零星的旁证材料,如陕西周原曾出土过一件蚌雕人头象,所刻画的种族特征,明显地是以西方人种为蓝本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即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居民,早在公元前12世纪前后就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相互交流。

#### 五、特殊的风俗及古病理

在现代民族志资料中,常常记录有某些后进民族至今仍保留有一些由于某种风俗礼仪的需要,而对人的身体的某些部位进行人为的伤残,假如这种伤残累及骨骼或牙齿,那么在遗骸上就可能留下痕迹。前面已提及的我国新石器时代部分地区的居民中曾盛行的头骨枕部人工畸形和拔牙的习俗就是。除这两种习俗外,我们在河北省邯郸市涧沟遗址的龙山文化灰坑中出土的人头骨上和河南省武陟县大司马遗址的灰坑中出土的人头骨上,均发现有死者被切割头皮时留下的切割痕迹。这种剥头皮的习俗曾盛行于欧洲大陆和南北美洲,在我国古遗址中,迄今虽只见于涧沟和大司马两处遗址存在有剥头皮痕迹的头骨,推测此种风俗也曾古代华北地区流行过,这确是发人深思的一个问题<sup>[97]</sup>。关于拔牙的习俗在四川发现的明代“焚人悬棺”的人骨中普遍存在。

人类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在生产劳动中尤其是部落间的械斗以及战争对人体造成伤残。因此古病理和创伤也是人类学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最早被注意的是三大口腔疾病,即龋齿、牙周病和错牙合畸形。20世纪50年代前辈学者毛燮均和颜闾就对河南安阳和辉县发掘出土殷代头骨的牙病进行过研究。尔后发表的人骨研究报告一般也都注意对口腔疾病的观察与统计。据初步研究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古居民中,龋病的罹患率与各群体的经济生活状况有一定的联系,在游牧经济形态的人群中,龋病的发生率最低,而在相对发达的农业经济人群中发病率最高。又如牙骨量不调在我国古代居民中与文明的发展程度相关,文明发展程度较高的黄河流域古居民的牙骨量不调的发生率较高。

除口腔疾病外,骨关节病也是在古代居民的个体中常见的患疾,几乎在所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的墓葬出土人骨中均发现有各种骨质增生的病理标本,多见于脊椎关节、肘关节、膝关节及髋关节。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或强直性脊柱炎)在青海乐都柳湾遗址马厂文化墓葬出土的329号墓的个体即是一例自颈椎至髋关节已全体融合形成竹节样脊柱,类似的病理标本在青海省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址出土的人骨中并非仅此一例。处于某种生存状态的人们,其健康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会受到文化和经济形态的影响,骨关节病的罹患率可能与生活环境及劳动条件相关。

创伤的实例,常见的有身体不同部位骨骼骨折后已愈合的标本,所采集到的骨折标本绝大部分均是错位愈合,说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还有由器械和暴力造成的各种骨折。如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出土的一例个体的股骨大转子部位有骨箭头深深嵌入骨骼中;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出土一个体的髌骨被石矛穿透;安阳殷墟祭祀坑出土的头骨有些在下颌骨下缘留有明显的被砍杀的痕迹:洛阳汉代刑徒墓出土的不少个体的颅骨和体骨上留有刀斧等器械砍杀的创痕,观察这些带伤残的标本就如同向我们展示出受刑者遭受杀戮的悲惨情景。

其他还有一些如在颅骨上钻孔,颅骨顶部大片脑被侵蚀缺损以及上颌骨部分缺损等标本有待深入研究<sup>[98]</sup>。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埋藏在地下的祖先的遗迹遗物丰富。从中新世晚期到现代这段人类起源与进化时期中,我国很多地区的古环境都适合人类生存。如能加大投入,完全可能为破解人类及现代人起源之迷,做出应有的贡献。随着考古学研究和古人类学研究的深入,必将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得到更全面的诠释。

注释:

[1] Schlosser.M., 1903, Die fossilen Säugetiere Chinas nebst einer Odontographie der recenten Antilopen. Abhandlungen der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ünchen, 22: 3-220.

[2] Teilhard de Chardin, P. and E. Licent, 1924, 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 Bull. Geol. Soc. China, 3: 45-50.

[3] Andersson, J.G. 1934, 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London.

[4] Wiedenreich, F., 1936a, Observations on the form and proportions of the endocranial cast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other hominids, and great ap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brain size. Pal. Sin. Ser. D, 7: 1-50.

1936b, The mandibl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Pal. sin. Ser. D, 7: 1-50.

1941. The extremity bones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Pal. Sin. New Ser. D, 5: 1-150.

1943, The skull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 primitive hominid skull. Pal. Sin. New Ser. D, 10: 1-484.

[5] 吴汝康等:《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



[ 6] 吴汝康等:《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 8: 1- 17。

吴汝康等:《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 10: 1- 16。

[ 7] 胡承志:《云南元谋发现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 1: 65- 69。

[ 8] 吴汝康、董兴仁:《湖北陨县猿人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18: 142- 149。

[ 9] 吴汝康、董兴仁:《安徽和县人化石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2, 1: 2- 13。

[ 10]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南京市博物馆:《南京人化石地点1993- 1994》,文物出版社,1997。

[ 11] 黄万波:《巫山人》,科学出版社,1991。

[ 12] 吴汝康、彭如策:《广东韶关发现的古人类类型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1: 159- 164。

[ 13] 吴茂霖:《贵州桐梓新发现的人类化石》,《人类学学报》1984, 3: 195- 210。

[ 14] 吴新智:《陕西大荔县发现的早期智人古老类型一个完好头骨》,《中国科学》,1981, 2, 200- 206。

[ 15] 吴汝康:《辽宁营口金牛山人化石头骨的复原及其主要性状》,《人类学学报》,1988, 7: 97- 101。

[ 16] 吕遵涛:《金牛山人化石的发现和意义》,《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

[ 17] 辽宁省博物馆、本溪市博物馆:《庙后山》,文物出版社,1989。

[ 18] 吴茂霖:《许家窑遗址1977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18: 229- 238。

[ 19] 许春华、张银运、方笃生:《安徽巢湖人化石化石地点的新材料》,《人类学学报》,1986, 5: 305- 310。

[ 20] 吴新智、张银运:《中国古人类综合研究》,《古人类论文集》,1978, 28- 41。

[ 21] 吴新智:《20世纪的中国人类古生物学研究与展望》,《人类学学报》,1999, 3: 165- 175。

[ 22] 吴新智:《山顶洞人的种族问题》,《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 2: 141- 149。

《周口店山顶洞人化石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 3: 181- 203。

[ 23] 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 1: 97- 104。

[ 24] 裴文中和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

[ 25] 潘其风:《中国人祖先的由来及民族起源若干问题》,《燕京学报》,2000, 2。

[ 26] 吴汝康等:《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 269- 276。

[ 27] 吴汝康等:《禄丰西瓦古猿和腊玛古猿的关系及其系统地位》,《人类学学报》,1986, 5: 1- 30。《禄丰大猿化石分类修订》,《人类学学报》,1987, 6: 265- 271。

[ 28] Cann, R.L., Mark Stoneking, Wilson, A.C, 1987, Mitochondrial DNA human revolution. Nature, 325: 31- 36。

[ 29] Black, D, 1928, A study of Kansu and Honan aeneolithic skulls and specimens from later Kansu prehistoric sites in comparison with North China an other recent crania, Palaeontologic, Sn.Ser.D, Vol.

6, No.1.

[ 30] 三宅宗悦:《赤峰红山后石棒墓人骨的人类学研究》,《赤峰红山后》,1938(日文)。

[ 31] 颜闾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考古》,1960, 9: 36- 47。

《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0, 1: 33- 43。

[ 32] 颜闾:《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62, 2:

[ 33] 颜闾:《大汶口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2, 1:

《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3, 2:

[ 34]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 35] 潘其风、韩康信:《柳湾墓地的人骨研究》,《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

[ 36] 韩康信:《青海民和阳山墓地人骨》,《民和阳山》,文物出版社,1990。

[ 37] 夏元敏等:《临潼姜寨第一期文化墓葬人骨研究》,《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 465- 484。《临潼姜寨第二期文化墓葬人骨研究》,《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 485- 503。

[ 3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陕西华县横阵的仰韶文化人骨》,《考古》1977, 4:

[ 39] 陈德珍、吴新智:《河南长葛石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985, 4: 205- 214。

[ 40] 张振标:《从野店人骨论山东三组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0, 18: 65- 75。

[ 41] 韩康信:《山东王因遗址墓葬人骨的人类学研究》,《王因》,《科学出版社》,2000。

[ 42] 韩康信等:《广饶古墓地出土人类学材料的观察与研究》,《海岱考古》(1),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

[ 43] 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 2:

[ 44] 吴海涛、张昌贤:《湖北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五十周年纪念会论文摘要汇编之一》,1979。

[ 45] 陈山:《大溪文化居民种族类型初探》,《徐州博物馆三十年纪念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4。

[ 46]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族类型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 47] 韩康信、潘其风:《太汶口文化的种属问题》,《考古学报》1980, 3。

[ 48] . . . ,1982,

[ 50] 笔者手稿。

[ 51] 潘其风:《大南沟新石器时代墓葬出土人骨的观察鉴定与研究》,《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附录,科学出版社,1998。

[ 52] 朱泓:《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种族》,《文物季刊》,1998, 1。

[ 53] 张银运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 15: 4- 13。

[54] 韩康信、潘其风:《河姆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观察研究》,《人类学报》,1983,2:124-131。

[55] 黄象洪、曹克清:《崧泽遗址中的人类和动物遗骸》,《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108-114。

[56] 吴定良:《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遗骸(下颌骨)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1。

[57] 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16:201-204。

[58] 韩康信、潘其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报》,1982,16:42-52。

[59] 韩康信、张振标、曾凡:《闽侯县石山遗址的人骨》,《考古学报》,1976,1:212-130。

潘其风:《福州闽侯县县石山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人骨的观察研究》,《南方文物》,2000,1:48-50。

[60] 韩康信、潘其风:《庙地沟二期文化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2。

[61] 韩康信:《山东诸城呈子新石器时代人骨》,《考古》,1990,7。

[62] 朱泓:《兖州西吴寺龙山文化颅骨的人类学特征》,《考古》,1990,10。

[63] 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1。

[64] 韩康信、潘其风:《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2:184-191。

[65] 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

[66] 潘其风、朱泓:《先秦时期我国居民民族类型的地理分布》,《纪念苏秉琦先生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0。

[67] 韩康信、潘其风:《殷墟祭祀坑人头骨的种系》,《安阳殷墟头骨研究》,82-108,文物出版社,1985。

《安阳殷墟中小墓人骨研究》,《安阳殷墟头骨研究》,50-81,文物出版社,1985。

[68] 杨希枚:《河南安阳殷墟墓葬中人体骨骼的整理与研究》,《安阳殷墟头骨研究》,21-49,文物出版社,1985。

[69] 潘其风:《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294-304,文物出版社,1989。

[70] 焦南峰等:《风翔南指挥西村周墓人骨的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3。

[71] 黄象洪:《北吕周人遗骸研究》。《北吕周人墓地》,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72] 潘其风:《碾子坡遗址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南邠州·碾子坡》附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73] 潘其风:《曲村西周墓地出土人骨的研究》,《天马—曲村》附录,科学出版社,2000。

[74] 莫楚屏、李天元:《曾侯乙墓人骨研究》,《曾侯乙墓》585-617,文物出版社,1989。韩康信、李天元,《包山楚墓人骨鉴定》,《包山楚墓》—J,04416,文物出版社,1991。

[75] 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1987。

[76] 秦学圣:《燧人十具骨架的观察与测量》,《人类学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

[77] 潘其风:《朱开沟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朱开沟》,文物出版社,2000。潘其风、韩康信:《内蒙古桃红巴拉古墓和青海大通匈奴墓人骨的研究》,《考古》,1984,4。

[78] 潘其风:《毛庆沟墓葬入骨的研究》,《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79] 朱泓:《内蒙古凉城东同时期墓葬》,《考古学集刊》(七),科学出版社,1986。

[80] 潘其风:《从颅骨资料看匈奴族的人种》,《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

[8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组:《赤峰、宁城夏家店上层文化入骨研究》,《考古学报》,1975,2。

[82] 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1。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北方文物》,1989,2。

[83] 潘其风:《内蒙古和东北地区商周时期至汉代居民的人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中国考古学论丛》267-278,科学出版社,1993;《平洋墓葬入骨的研究》,《平洋墓葬》,文物出版社,1990。

[84] 潘其风:《大甸子墓葬出土入骨的研究》,《大甸子》224-322,科学出版社,1996。

[85] 朱泓、王成生:《彰武平安堡青铜时代居民的种族类型》,《考古》1994,2。

[86] 刘宁:《顺山屯青铜时代居民的人种学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4,1。

[87] 魏海波、张振标:《辽宁本溪青铜时代人骨》,《人类学学报》,1989,4。

[88] 贾兰坡、颜闾:《西团山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63,2。潘其风、韩康信:《吉林骚达沟石棺墓入骨的研究》,《考古》1985,10。

[89] 韩康信:《沈阳邦家洼子的两其青铜时代人骨》,《考古学报》1975,1。

[90] 朱泓、贾莹:《九台关马山石棺墓颅骨的人种学研究》,《考古》1991,2。

[91] 潘其风:《我国青铜时代居民人种类型的分布和演变趋势》,《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294-304,文物出版社,1989。

[92] 潘其风:《曲贡遗址及石室墓出土人骨鉴定和研究报告》,《拉萨曲贡》234-23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93] 张君:《青海李家山卡约文化墓地入骨种系研究》,《考古学报》,1986,3。

[94] 韩康信:《丝绸之路古代居民种族人类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

[95] 潘其风:《1995年及1997年尼雅遗址出土的干尸和颅骨的观察研究》,《中日共同尼雅遗址学术调查报告书》第二卷,161-176,中村印刷株式会社,1999,日本东京。

[96] 潘其风:《新疆地区古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收获》,《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讨论会发言提要》12-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2000。

[97] 潘其风:《河南武陟大司马遗址出土人骨》,《文物》,1999,11:72-77。

[98] 潘其风:《古病理学的鉴定及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意义》,《科技考古论丛》(第二辑),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合肥,2000,34-38。